



□金后子

汽修厂的小赵,是我经常搭车的主。他个子不高,全身肌肉结实,一张娃娃脸上总是带着笑意,头发总是往一边梳着,一副自信潇洒的模样。坐在车上,我们无话不拉,问到年龄,当他吐出“34”这个数字时,我心头一颤!

1962年,我的父亲,当年已有了五个孩子的父亲,告别城市回到章丘老家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年龄呀!虽没人给我讲过,但一闭眼就能想象出父母弃城返乡的场景。年长父亲两岁的母亲怀抱着还不到半岁的我,手里牵着三姐、大姐、二姐,哥哥跟在父母的后面,背着简单的行李。一家人从那挤爆的绿皮火车里出来,看到的是家乡一片茫茫的大地,心里存着一点憧憬和炽热——可这份憧憬和炽热很快就被荒草野坡的残酷现实击打得粉碎!母亲不止一次地讲过,有着家庭绝对权威的父亲是背着她辞去公职返乡的。因为父亲正处在意气风发的年龄,对未来充满信心,听信了老家去青岛办事的几个少爷们的忽悠而怦然心动。可一旦回到乡村,所有的理想灰飞烟灭,很快就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泥潭,家里穷得几乎到了沿街乞讨的地步。

回到村里的第三个年头,家里又添了弟弟,本已破落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。在我幼时的记忆里,家里的房子是分几年垒起的,先是砌起地基,后是囤积土坯砖石木料,再是靠少爷们帮忙完成主体,主体盖起三年后才安上门窗。农村衡量贫穷或殷实,只需看看你家房子优劣或者说房子上砖瓦的保有量就知道了。而我家的房子从上到下没有块砖片瓦,几乎全是用土坯和麦秸掣起来的,且几年安不上门窗。每到冬天,总是用几块塑料布把伤疤般的门窗遮了又遮,挡了又挡。尽管这样,寒风还是无情地灌入,室外多冷,室内就多冷,水缸里的水总是结着一层冰。冬天的早晨,母亲摸黑起来为一家人做饭时,先得用菜刀把水缸里的冰击碎,才能取出水来。母亲讲,这房子不盖不行,哥哥姐姐们都大了,跟父亲挤在一起,实在是说不过去。

印象中,盖房前后,父亲满面愁容,沟壑纵横的脸上阴云不散,头发又稀又白,牙也掉了多半,年纪不到四十岁却是一脸的沧桑。搬进新房的父亲,总习惯双脚圪蹴在那把陈旧的椅子上,抽着旱烟,两眼发呆,嘴里不时发出一声声长嘘短叹,瘦弱的身躯隐在那木椅里显得有些空荡,所以乡人们就送给他一个绰号——烧鸡。他瘦弱的身體与繁重的农事看上去既不协调也不匹配,每次下地回来,累得一句话都不愿说,动不动就发脾气,有时会在床上躺一会或狠狠地吸上一袋烟才吃饭。好在略通文墨的他,经过自荐和别人推荐干上了生产队的小会计,成了一名半脱产的社员。但这丝毫没有阻挡贫困的脚步,随着孩子们长大消耗的增加,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,青黄不接之时,家里揭不开锅是常事。

我跟弟弟从小是没有大名的,仅仅是父母随意



起的乳名,直到上学了,才知道自己没有学名。记得学校报名的那天早晨,没有学名的我被学校轰了回来,就站在家里老屋的门口哭,不停地用右手指甲划着门框。见我哭,大姐过来了,用手抚着我的头说:“甭哭了,等晚上我给你挤一个名字。”“挤一个名字?”我头脑里充满好奇。晚上,昏黄的油灯下,大姐先是找来一张白纸,撕成一个个小纸条,上面分别写上“锋”“禄”“祥”“和”等几个当时很时髦的字,捏成纸团,在手里晃了几晃,对我跟弟弟说,“你俩挑吧,每个人只拿一个。”我上去就拿起那半张着嘴的纸团,打开一看是“锋”字,辈分是“炳”字,姓李,自然就有了“李炳锋”这个名字。弟弟顺手挑了一个“禄”字。见我们有了各自的名字,大姐激动地说:“这两个字都很好,希望你俩长大后一个做雷锋,一个做焦裕禄。”我心里清楚,那是大姐对我们兄弟二人寄予的美好希望。其实,当时我心里有些抱怨,识文断字的父亲为什么不在上学前为我们起好名字呢?还不如人家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父母。但随着年龄增长,尤其是自己成家立业后就明白了,之所以父亲没为我们起名字,是因为生活的重担几乎把他的腰压弯,返乡后窘迫的境遇,已经把他心底所有美好的东西全都泯灭了。面对全家人连肚子都填不饱的窘境,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父亲,哪有心思给孩子起名字?再说这么多孩子也不是他从心里想要的,能养活就不错了。全家八口人的生计都压在他那瘦弱的肩上,还有爷爷需要赡养,是没有心思考虑别的。心底一丝浪漫的色彩也没有,别说起名了,甚至看见孩子就烦。

不过,凡事也有例外。一年中最轻松的一段时光,是年后父亲带我们去姑奶奶家做客,这也是我们兄弟姐妹一年到头最期盼的事。父亲带着几个孩子,行走在空旷的大地上,小麦隐身在田野里,北风吹着,一两只喜鹊在光秃秃的杨树上跳来跳去,仿佛在戏弄着我们。倒背着手的父亲嘴里念叨着:“大年初一头一天,过了初二过初三,正月十五半个月,春到寒食六十天。”

到了姑奶奶家里,总算能实实在在吃一顿好饭饱饭。姑奶奶做的菜里,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肥肉,饭是大米干饭,那是多么香的饭呀,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味道。姑奶奶的村子离我们村不远,是五六里的东乡,那是绣江河流经的地方,种水稻吃大米。每次去,没到姑奶奶的村头,老远就能看见三台青色的水磨,哗哗地转着。水草在清清的河水里摇曳,偶尔有鱼儿在水里蹿上蹿下。姑奶奶的院里有一口水井,水离井口很近,也就只有十几厘米吧,添锅做饭,姑奶奶就直接从井里舀水。井里还有一条鱼,是一条足有半米长的黑鱼,它总是静静地卧在井底一侧,与井底石块青苔混在一起,不仔细辨认,黑黢黢的几乎分不清彼此。黑鱼的上面还有一簇一簇的叫不上名的小鱼,它们在水里跳来游去,很是自由欢实。每当看到这些景象,我的心里就生出很多美好,感觉世界上是有天堂的,那天堂就是姑奶奶家的生活。

东营杂咏

□蒿峰

垦利华滩万亩葵花

华滩荒野著新裳，
万亩葵花列阵长。
一片金波连碧海，
含英朝日不争芳。

利津黄河三角洲保护区

大河东注水茫茫，
两色锦绸蓝与黄。
百鸟生繁遮海口，
铁门关外彩云长。

广饶刘集村保存有首版

《共产党宣言》

小村藏至宝，
首版贵《宣言》。
鲁北星火火，
传薪铸党魂。

黄河口

息壤携流入海探，
横涂竖抹赤黄蓝。
长河落日惊神手，
天水相连三尺三。

再至孤岛植物园

当年创业共艰辛，
转眼沧桑半百身。
傲雪凌霜等闲过，
根深叶茂骨嶙峋。

采桑子·东营生态巨变

土黄碱白连沧海，草也难生。树也难生。沙漠风摧见秃城。
恍如仙境临河口，天地青青。街市青青。身至东营一梦惊。

拾 零

□商玉珍

满江红·端午怀屈原

一曲离骚，华夏颂，五洲唱远。路漫漫，仰天南望，征鸿鸣雁。仗剑忧天求索梦，孤忠报国流亡倦。念故都，风飏楚魂牵，愁肠断。

潇湘恨，相思满。香粽撒，雄黄奠。竞龙舟击浪，年年怀缅。独领风骚千古颂，长存浩气人生看。又端阳，吟国粹辞章，星光璨。

忆秦娥·咏菊

清秋逸，菊开灼灼金黄色。金黄色，纤丝艳射，娇容羞涩。
冷香寒蕊含情脉，秋丛点点开阡陌。开阡陌，迎风摇曳，傲霜清瑟。

诗人通灵皆为仙

□王雷

阿波利奈尔和李贺
坐在巴黎的咖啡馆
荷尔德林与李商隐
共饮在柏林酒吧间
里尔克正与冯至在西南联大
热烈拥抱后侃侃而谈
在彼得堡的林荫小路上
阿赫玛托娃挽着屈原
波德莱尔手持一束《恶之花》
从忧郁的巴黎去到明丽的泉城济南
赠送未音 作为永恒的纪念
洛尔卡和吴开晋碰杯相干
在西班牙马德里的豪华大酒店
这当儿
布罗茨基匆匆走进来
急切地打听红泥岸

【心香一瓣】

暖暖的父亲

□周学胜

父亲离我而去快十五年了。每当想起生我养我的父亲,我总是以泪洗面。

抱憾终生的是,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,我未能守候在他老人家的身旁。那是2005年7月底的一天,得知在老家的父亲胃癌复发入院,我立即告假从北京急奔山东。等我一路奔波于次日凌晨赶至医院时,父亲已经与世长辞。仅差半小时,父子阴阳两隔!此前不久,我最后一次探望父亲离家返京时,他早早起床,拄着拐棍,拖着病体,颤巍巍地把我送到大门口。当时本能告诉我,此后父子相见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。却没承想,这竟是永别!

山山而川,人生海海。回望父亲这一辈子,不但得一声叹息。父亲生于1929年,是爷爷、奶奶所育两子两女中的长子,讳名益三,“三”字是家族中的辈分。因受过中等教育,新中国成立不久,父亲便成了公办教师,教了一辈子书。但是,一直生活在农村,没少和土地打交道,称其为“农民”一点也不为过。和同代人一样,父亲经历过战乱、灾荒和数不清的“运动”,饱经世事沧桑,备尝人间冷暖。

吃苦耐劳、忍辱负重的父亲是全家人的依靠。很长一段时间,家中的生活全凭父亲一人挣钱维持。当教师,他是行家里手;种庄稼,肯定比不过老把式。但为了让家人吃上饭,为了少向村里交口粮钱,就得业余多干农活。包产到户后,更要靠自己干。家里缺人少马,让父亲吃尽苦头。由于家中没有强壮的男劳力,不知遭过多少人的白眼。因为无权无势,不知受过多少或明或暗的欺凌。作为一家之长,父亲只能把苦难和屈辱咽在肚子里,苦苦支撑着八口之家,尽量让孩子们有个温暖的港湾。
俭朴、实在和善良是父亲的牢固底色。无

论穿衣还是吃饭,他从不讲究,一年到头缝缝补补,粗茶淡饭。对自己和家人,节省到近乎吝啬。但有亲友上门,就另当别论了。通常是客人刚坐下,他习惯性地把手一扬,喊一声:“孩儿他娘,上街买肉,包饺子!”我还记得,当年父亲有一辆“大金鹿”自行车,当时还算稀缺之物,不时被借来借去。有人用后,不是把车子弄得满身泥就是蹭掉漆。父亲一边轻轻擦拭,一边心疼地说:“以后谁也不借了。”说归说,等到有人求上门来,还是爽快地借出去。“开口求人的滋味不好受,不能让人家出不去门。”这应该是父亲凡事推己及人的内心独白吧。

父亲是一个重感情、知感恩的人。早年,父亲在邻县益都黄楼公社(今青州市黄楼街道)张老村小学任教十年,不仅书教得好,人缘也是好得常人难以企及。在那里,他做家访、吃派饭,对每个学生、每户家庭了如指掌,村民们都把他当作自家人。1960年闹饥荒,村里合伙送了上百斤小米和七个车轮大的豆饼,使我家免受断粮之苦。父亲离开村子十五年之后的1984年,我奶奶去世,村里闻讯后仍有二三十人前来吊唁,坐满了整整两台拖拉机。这份情,父亲记了一辈子,念叨了一辈子。在我小的时候,还经常带着我去村里“认亲戚”“走亲戚”。就在去世前几个月,父亲还特意让人开车载着他回村转了转,会了会健在的老友,见了见房东的后人。我想,自知来日无多的父亲是去告别的,更是去谢恩的。

父亲的正直清廉在家乡教育界是出了名的。从外县调回本乡后,他教过文化课,干过中学司务长,当过小学校长。他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,不论家境如何,全都一视同仁,更不会找家长“走后门”。他掌管公款公物,不仅自己不贪不占,别人也甭想从中捞半点便宜。“公家的东西,哪怕是一根草刺儿,谁也不能

动。”这是他坚守的信条。当初我自己买纸订本子,父亲硬是不允许我用学校的订书机“咔嚓”一下。自律之严,可见一斑。

可能是中年得子的缘故,父亲对我尤为疼爱,既怕我病弱不长命,又忧我长大被人欺。我开始记事时,父亲身体已经发福,为了哄我开心,他常常费力俯下有些臃肿的身子陪我做游戏,出门遛弯儿就把我驮在他那宽厚的背上。每每我考了“双百”、评了“三好”,父亲就乐开了花,立马到集市上买半斤炒花生作奖励。后来,我考上大学、分配到北京工作,成了他最大的欣慰。等我结婚成家、添了儿子,父亲数次喜极而泣。我赴上海读书前,父母给我立了个规矩——每月给家里写一封信。我照办了,坚持了十几年,直到家中装上电话。父亲也是每信必复,收信即回。我收拾父亲遗物时,发现床底有一个包裹得严严的纸箱子,打开一看,全是我从上大学以来写给家里的信!我顿时泪目了,不用问,在外奔波闯荡的我,始终是父亲最大的牵挂!

丧父之痛,难以言表,非亲身经历不能体会。父亲走了,那道替我挡风遮雨的墙倒了,再也没有人倚门翘首盼儿归,曾经的音容笑貌也只能从回忆中找寻。偶有幸运和荣耀降临,没有了父亲的见证和喝彩,一切变得索然寡味;遇到挫折和低谷之时,缺少了父亲的宽慰和教诲,令我更加惆怅落寞。

父亲离世十几年了,他忠厚传家、勤俭持家的往事成被人提起,老实做人、本分做事的品行仍为人津津乐道。让人可亲可敬,给人以温情温暖,是大家忆及父亲时的同感共识。我是父亲的孩子,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,其言传身教会继续伴我前行,使我受益终生。

父亲,暖暖的父亲,在天堂里安好,我的思念绵绵无期。